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郭齐勇
编

熊十力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郭齐勇
编

熊十力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熊十力卷/郭齐勇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300-18602-3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熊十力 (1885~
1968)-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961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熊十力卷

郭齐勇 编

Xiong Shil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0.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5 000	定 价	4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径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湖北黄冈人。熊十力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研究哲学，曾从欧阳竟无研习法相唯识之学，继被蔡元培礼聘为北京大学讲席，后不满于佛法，自创《新唯识论》，重建儒学，成为“后五四时期”我国哲学界奇特的、颇具独创精神的思想家。熊十力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一生著述宏富、神解卓特，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会中、印、西思想，建树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冶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熊十力哲学具有自身的特色：重人文，尊生命；反空无，箴寂灭；主健动，阐变易；严思辨，倡体悟；一理欲，明道德；合天人，扬主体。熊十力在佛学、因明学、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特别在重建新儒学上创获颇多。他的哲学思想日益被海内外学者所重视。张岱年曾经指出，熊先生“著作丰富，内容宏博渊奥，确有甚深义蕴，以他的哲学著作和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实无逊色”^①。汉米敦（C. H. Hamilton）老博士为《大英百科全书》1968年版写的熊先生小传，肯定熊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认为他的哲学是“佛学、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

与学院派的哲学家不同，熊十力是来自民间，来自社会最下层，亲

^① 张岱年：《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哲学家》，见《回忆熊十力》，3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身体验了民间疾苦，并把这种体验、感受融进其哲学创作中去的直感型的哲人。

熊十力于乙酉（清光绪十一年，即 1885 年）正月初四出生在湖北黄冈县上巴河以北张家湾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世穷困，其父以上三世皆单丁，都无立锥之地。他的祖父敏容先生为乡间木匠，父亲其相先生则掌教于乡塾。熊先生幼时为邻家放牛，只是在父亲和长兄仲甫的教育下才粗通文墨。熊十力十二岁时，其父贫病交加，又遭乡间恶霸陷害，含恨而歿，不久其母辞世，家境更加穷困。熊十力随兄耕读，三日牧牛方得一日读书，备尝生活艰辛。其后，父亲的朋友何圣木先生喜其聪颖，免费让他上乡塾读书。熊氏却难受约束，仅仅读了半年就出走了。

熊十力很早就养成了勤奋自学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十六七岁，游学乡间，捧读陈白沙书，对“禽兽说”感受很深。他领悟到，人生的使命和价值不在饥食渴饮、争权夺利，而在超脱物欲，自识至大无匹之真我，如此才能做到与天地万物合德，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此时，邻县有某孝廉上公车，每每购置新书回里，十力常去借阅。读到“格致启蒙”之类，大开眼界，遂视六经诸子为土苴，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骂。又读到当时维新派论文和奏章，知世变日剧，即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书置座右。清末政治腐败，民族危机深重。十力捧读严译《天演论》，深为“物竞天择”“自强保种”的召唤所感染；同时，“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①。

1900 至 1901 年，熊十力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三位青年身居社会下层，同情劳苦大众，养成叛逆性格。何自新主张运动军队，熊氏力表赞成并以身先之，投第三十一标（即上说凯字营）当兵。十力白天上操练武，夜间读书看报，撰写文章，向报馆投稿，主张变革现实，救亡图存。

1904 年 7 月，张难先、何自新等在武昌创立革命党团——科学补习所。1905 年春，王汉刺杀清阅兵大臣铁良于彰德火车站，未果，壮烈牺牲。是冬，熊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仁字斋为学兵。由于操课在校，就寝在营，各营士兵接触频繁，熊十力利用这一机会宣

^①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三，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425 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传革命，联络同人，揭露清吏。他曾在学堂揭示处张贴了揭露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罪恶的短文。

1906年2月，刘静庵、何自新等在武昌成立日知会，得到东京同盟会的支持。是春，熊十力加入同盟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该社即成为日知会的外围组织，社员不限于黄冈籍同志，以订兰谱的方式，联络军学界志士。熊十力主持了该社的活动。每星期日，社员集会，熊十力等以孟子、王船山、黄宗羲思想阐发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借讲《春秋》辩论种族关系，借讲《周礼》提倡地方自治。熊氏领导社员在军学界宣传《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和黄冈籍同人改写的《孔孟心肝》等。当时有人认为武昌不易发动革命，熊十力与何自新力辟其谬。

是夏，熊十力肄业于陆军特别小学堂。他提出，暗地联结荆、襄、巴、蜀及河南秘密会党与洪门哥老会等，使之发难于各地，清廷必遣军队去围剿，而军中同志即可乘机举事，中原不难光复。熊氏为此奔走军中甚为得力，响应者众多，风声渐大。不久事泄，熊十力被鄂军通缉，张彪等悬赏五百金购熊氏头颅，幸有友人事先暗通消息，秘密掩护，熊十力得以出逃，潜往鄂西恩施诸山。

事稍缓，十力归乡授徒。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十力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活动，后来省城任湖北督军府参谋。民国元年，熊十力参加了编辑日知会志的工作。次年，二次革命失败，熊十力回到江西德安（自1906年始，熊氏家族迁居德安），垦荒耕田，攻读先秦诸子和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西方哲学书，亦教过一段时间的私塾。

熊十力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向往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篡国，反对北洋军阀政府。1917—1918年，孙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熊氏由江西入湖南参预民军，支持桂军北伐，抗击段祺瑞的进攻，不久即赴粤，佐孙中山幕，奔走于两广、西南。熊氏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痛惜鼎革以还，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军阀官僚贪污、淫侈、残忍、猜妒、浮夸、诈骗、卑鄙、苟且，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慨叹“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先生“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

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先生自称“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①。

十力由广州返回德安，流寓匡庐西麓，题壁有：“数荆湖过客，濂溪而后我重来。”是年（1918年），熊氏汇集两年多来的笔札二十五则，编成《熊子真心书》，自印行世。在这部处女作中，有为日知会战友立的小传，有研究王船山、孟子、老庄和佛学的心得。蔡元培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奖掖提携，亲为之序。序中说：“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合儒释。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静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宁静致远之效，庶几横流可挽，而大道亦可无事乎他求矣。”^② 蔡、熊二人当时都有道德救国的思想。先一年，蔡先生创进德会于北大，熊氏“由远道贻书赞助，极声应气求之雅”^③。此后蔡先生经常关心熊氏，给予他许多帮助。

1919年前后，熊先生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此时他才看到梁漱溟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该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并指名批评熊升恒（即十力）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指斥“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的文章。笔墨官司促成了二人于1919年暑假在北平广济寺相会，并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由于梁的介绍，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当时是金陵刻经处研究部）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学，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接受了理性思辨的严格训练。1922年，梁漱溟打算抽身自己办学，征得蔡元培同意，去南京请欧阳门下高足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这为他锻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只有在北大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只有在蔡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下，熊十力才得到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

熊先生的中年时代是沉潜冥思、自立权衡的时代。他决不随波逐流，亦不囿于陈说，从1918年到1922年，他经历了由儒转佛，直从大乘有宗入手，后舍有宗而深研大乘空宗的学术历程。1923年到1932年，则是熊十力酝酿、营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关键年代。熊十力在北大

①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三，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425页。

②③ 蔡元培：《熊子真心书序》，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3页。

讲授法相唯识之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一步一步背弃师说，由佛归儒。1923年，北大印制熊先生《唯识学概论》讲义，分“唯识、诸识、能变、四分、功能、四缘、境识、转识”八章，约九万余言，基本上依据于世亲、护法之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是年，忽盛疑旧学，于所宗信，极不自安，毁弃前稿，开始草创《新唯识论》。1926年，北大印制了熊先生第二种《唯识学概论》讲义，含“唯识、转变、功能、境色”四章。这一稿以功能说为本体，与旧义绝异。这一年，为讲授因明学之需，熊十力删注窥基《因明大疏》，由北大和上海商务分别印行，是书为治因明之津梁。1930年，公孚印刷所印制的《唯识论》，分“辩术、唯识、转变、功能、色法”等章（末章有目无文），标志熊十力由主张“众生多元”改变为主张“众生同源”，由赞同轮回说改变为批判轮回说，扬弃佛学的“非人生”倾向，确认“儒家的人本主义”才是“大中至正”的。此稿与1923年稿相比则主张根本变异，与1926年稿相比也改变了十之三四。是年还将1924至1928年与高赞非论学语录和一些信札，经张立民整理删削并序，编为《尊闻录》印行。

大约在1925年前后，熊先生为自己更名为“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如来”即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他具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沈约《内典序》也有“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之说。1932年10月，体大思精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终于在杭州出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这是熊十力哲学成熟的标志。在此之前，由于殚精竭虑，熊十力患下了神经衰弱、遗精和胃下垂等疾病，曾于1927年以后到杭州休养。养病期间的生活来源，由蔡元培和教育部关照北大发给薪金。在酝酿、建构、确立其哲学体系的十年间，熊十力得以与友人林宰平、马一浮、梁漱溟、张东荪、汤用彤、钱穆、蒙文通、张申府等先生反复切磋、辩难。是书九万余言，分“明宗、唯识、转变、功能、成色上下、明心上下”诸章。以后的《新论》语体文本大体沿此架构。对于这样一部传世之作，学术界毁誉参半，争议颇大。

熊先生陶铸百家，贯通中外，形成了他的创造性的哲学系统。马一浮和蔡元培给予了高度评价。蔡序指出：“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蔡元培说，佛典中有高深的哲理，“惜二千年来为教界所限，未有以哲学家方法，分析推求，直言其所疑，而试为补正者。有之，则自

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始”^①。蔡元培对于熊氏之出入于佛学的哲学家气魄和贡献，许之甚高。

《新论》文言本出版之后，佛学界人士几乎群起而攻之。论战持续了几十年。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即于《新论》文言本出版的当年（1932年）开始，刘定权（衡如）作《破新唯识论》，欧阳先生亲为之序，猛烈批评《新论》。熊十力于次年年初出版《破〈破新唯识论〉》加以反驳。熊十力治学的特点是不依经傍传，不拘家派，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料都有所取、有所破，意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直到晚年，熊先生一直保持了他自立权衡、径行独往、无所依傍的学术品格。他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化了的佛学有着敏锐的直觉、深切的理会和强烈的共鸣。熊十力晚年的著作，常常自署“黄冈熊十力造”。这个“造”字，在印度是被尊为菩萨的人才能用的。

熊十力哲学体系虽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然充实、发展、完善这一体系并使之在国内哲学界具有一定影响，还是抗战前后的事。抗战期间，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穷困，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熊先生装扮成商人由学生刘公纯陪同，从北平城南出逃，乘运煤的货车，历尽艰辛回到武汉。1938年春，熊先生入川，在颠沛流离之际不废讲学，与学生邓子琴等讲民族精神、种原及通史，砥砺气节，确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因作《中国历史讲话》，力图为各民族团结抗战提供历史依据。熊先生的忧患意识、乐观精神，他全部的真挚的情感都倾注在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之上。熊先生以大无畏力，平章华梵，融会佛儒，自创新论，于西化之风狂飙突进之年代，为改造东方旧学，开辟新途，可谓孤往直勇，用心良苦。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哲学，这就是他创制体系的出发点。他对于五四运动之后菲薄固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和所谓“本位文化”的主张均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两派其实都不懂得“西方之真”和“何者为国之粹”，指出必须深切了解西洋人所以成功现代文化之根本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讳短，不掩长，相互融和，自觉创新。他说，“此土著述，向无系统，而浅见者流，不承认此土之

^① 蔡元培：《新唯识论序》，见《蔡元培哲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又见《熊十力全集》第二卷，4、5页。

哲学或形上学得成为一种学”，因此，创造一种融和了西方科学思想和知识论，又继承了东方哲学的骨髓与形貌，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无不网罗融合，具有系统严谨之体制的哲学，就是非常之必要的了。作为有识的哲人，熊十力不满足于转手稗贩，在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抗战年代，矻矻孜孜，熔铸百家，发展了三十年代初的思想，完善了昂扬进取、思辨细密、中国化了的、成体系的哲学，既为辛亥革命作出理论上的补课，又为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使之具有世界价值和现代意义，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面对西方、印度或我国的先圣先贤、哲学大家，熊先生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他一生“求真”、“忌俗”，甘贫贱，忍淡泊，去浮华，务潜修。他赞扬船山所说的“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浮浅知识及肤滥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至其所笃信，则必其所真知者矣。不知而信之，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辗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污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因此，他反对“好名”、“好胜”，强调学者必须耐得住寂寞，有一种“孤冷”、“孤往”精神和毅力。“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澹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他批评李恕谷等结纳官僚、名士“以广声气为宏学者”，“忍不住寂寞，往来京邑，扬誉公卿名流间，自荒所业。外托于宏学，其中实伏有驰骛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乐名者逐于名，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而毁誉之情俱。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①这种堂堂巍巍做人，独立不苟为学的自立之道，今天对于我们学术界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的学人，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学术。

为了锻造我们民族的哲学体系，熊十力自甘孤独，自甘寂寞，伏案数十年如一日。他在给徐复观的信中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他长期不与家眷住在一起，

^① 熊十力：《尊闻录》，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577～581、641页。

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四时左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入蜀之前，在北平相继出版了《十力论学语辑略》和《佛家名相通释》。入蜀之后，除在马一浮主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主办的勉仁书院和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短期讲学外，主要的工作是将《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改写成语体文本。这是对自己哲学体系的补充、修正、扩大与发展，工作量很大。熊先生当时“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①。1939年8月19日，日寇飞机轰炸乐山，熊十力左膝受伤，寓舍全毁于火，频年积稿尽毁，幸有部分笔札为学生陈仲陆录有副本，遂将此辑为《十力语要》卷二。《语要》卷二和《新论》语体本卷上、卷中，都是靠朋友和学生的资助才得以印制的。直到1944年春，语体本全书三卷32万字，才由冯友兰、贺麟、金岳霖为常务理事的中国哲学会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的第一部书稿交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抗战期间熊十力虽未到昆明西南联大，但仍被北京大学续聘为文学院教授。

熊先生学无常师，堂庑甚广，才气过人，自视很高。读书之过目不忘就令其弟子瞠目。他说：“吾平生著述与笔札之属，字字从胸中流出。稍有识者，当能知之。吾所为文字，向不肯引古书。有时对流俗须征引旧文，但此等处亦不多。……陆象山云：六经皆我注脚，未可如言取义。（如言，即执著言说之谓。）”^②他写作的速度是惊人的。《新论》的姊妹篇、熊十力政治哲学和思想史专著《读经示要》一书30万字，“肇始于六十揽揆之辰，毕事于寇迫桂黔之日”，即1944年虚岁六十寿辰（正月初四）起草，迄秋冬之际而毕。据说，《读经示要》自序就是在北培镇长卢子英刚刚捐给熊十力办哲学研究所的一座空荡荡的房屋中写的。当时，所用的毛笔秃而掉毛，没有砚台，用两只粗饭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写作条件之简陋，可见一斑。鉴于此书极有价值，1945年，中国哲学会将它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三交重庆南方印书馆印行。

《读经示要》在研究先秦、汉宋和明清学术思想史方面颇有见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是书推《周官》、《礼运》、《周易》和《春秋》为我国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典。在当年政府讳言民主的高压之下，熊

① 熊十力：《新唯识论·初印上中卷序言》，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5页。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卷下之二，见上书，538～539页。